

# 金石永固：秦汉马纹瓦当的艺术呈现

■刘杨(山东滨州)

传统吉祥纹样在瓦当之上的运用颇为广泛,盖因瓦当作为建筑檐廊的重要构件,承载着房屋主人护佑家宅、祈愿平安的精神诉求,是传统民间信仰与艺术审美交融的载体。马纹作为自春秋战国时期便已流行的经典吉祥纹样,在历代瓦当中的出现尤为常见,其演变轨迹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艺术风貌与文化内涵。

## 马纹瓦当的图像

自战国以来,陕西地区写实风格的动物纹瓦当艺术便进入兴盛阶段,其造型精巧,极具地区特色。及至秦代,此类动物纹瓦当多出秦都雍城遗址,不仅工艺精湛、艺术价值极高,而且其自由率真的动物造型,更鲜活映现了秦代豪放洒脱、质朴天真的社会风尚与审美趣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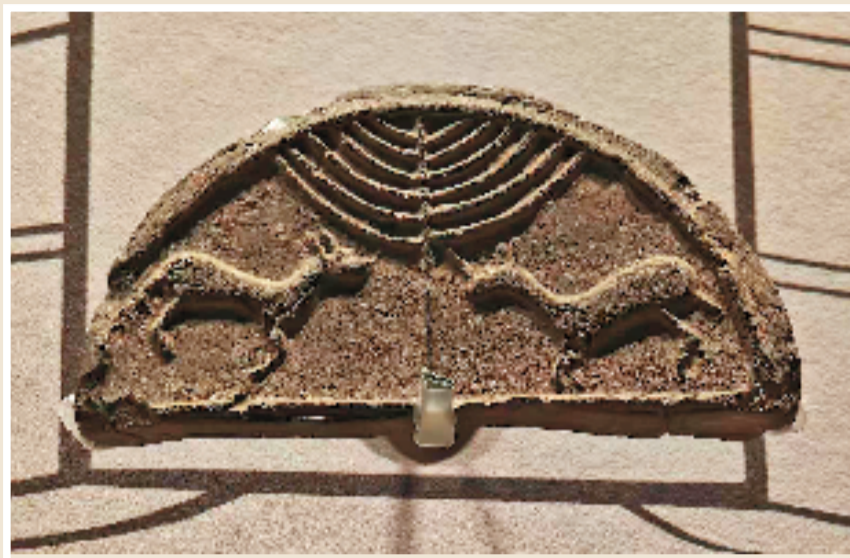
采集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史家河村的马纹瓦当,属秦汉时期遗物。此瓦当图像由三部分构成,其以中间部分的单马屈膝跃起的形象作为整个图像的主体部分,马的刻画生动传神,造型高度凝练,线条流畅劲挺,马的头吻修长,与隆起的鼻翼自然衔接,下颌角显著外凸,勾勒出其面部坚实的骨型轮廓,臀部高高扬起,后腿肌肉紧绷,时刻处于发力前进的状态,运动感较强。其似鹿似马的造型,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树下对马

纹样的造型,但对图像的处理较为生动自然,突破了前者对马纹样造型略显呆板的样式,充满了秦汉时生动豪放且质朴的审美情趣。

## 马纹瓦当的文化内涵

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秦先祖大费辅佐舜调教鸟兽,鸟兽都很温顺,舜很高兴,于是赐其姓嬴氏。至西周孝王时期,非子为周王室养马,“马大蕃息”,孝王封非子于秦,秦国自此开始兴起。据此可知秦人善畜牧、狩猎特别是对驯马较为精通。故此秦人对马有较为特殊的情感,其在秦人的生产和生活中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将生产生活中对马的印象反映在瓦当纹样艺术上,寄托了其

对马此种生物的特殊情感。同时,马纹样作为中国传统纹样体系中的重要遗存,其历史渊源深远且长久。在功能观念的影响下,吉祥的寓意成为中国传统纹样的共同精神内核,而马的形象凭借其矫健雄姿与奋进的姿态,被赋予了不畏艰难、积极进取、坚持不懈的美好品德。在一些传统纹样中,马纹样常与其他的吉祥元素相组合,如马与猴子的形象相搭配,寓意“马上封侯”,象征着官运亨通,仕途顺遂的期许;马与牡丹相搭配,寓意“马上富贵”,象征



树下对马纹瓦当 摄于青州博物馆

着财运亨通,生活富足的愿望。这些经典范式的运用,无不印证了马纹在中国传统寓意上的吉祥内核。同时,马在中国古代不仅是生产生活的重要助力,而且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表现,是一个民族英雄形象的精神化身。

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,人们对长生的追求由来已久,“升仙”“长生”这一思想往往构成了早期美术文化遗存的精神内核。马的现实形象与从西域传入的“天马”的象征意蕴相融合,共同成为长生不

老愿望的文化载体。情感上人们对“天马”的渴望与依赖,使马这一纹样进一步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,带来了马纹样使用场景的扩宽和普及。并且,如采集于史家河村的马纹瓦当中,也出现了马与树形象的结合,此种马与树纹样的组合,亦寄托了先民对“长生”的坚定追求。

因此,在瓦当之上的马纹样承载着双重的文化意蕴,成为连接现实与理想的精神纽带,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内涵的独特魅力。

# “天马”崇拜与两汉时代精神

■翟振嘉(陕西榆林)

汉代美术中,“天马”形象尤为突出,普遍出现于石刻、画像砖、青铜器、陶俑等各种门类的艺术中。这些遗存并非单纯的艺术想象,“天马”崇拜的兴起与盛行,反映着汉代雄浑大气、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,是汉代人精神世界的具象表达。

何为“天马”?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中:“马成之山有兽焉,其状如白犬而黑头,见人则飞,其名曰天马。”这是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“天马”一词,天马为一种犬状黑头、见人则飞的异兽。而至汉代,“天马”形象的塑造,则与汉帝国的国家意志紧密关联。汉初国力羸弱,匈奴屡次袭扰边境,汉朝缺乏善于作战的良马,多次在交战中失利。武帝时期,为获取西域的汗血宝马,发动两次汉宛之战,良马的获取直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记载:“初,得乌孙马,好,名曰天马。及得大宛汗血马,益壮,更名乌孙马曰西极,名大宛马曰天马。”武帝刘彻将从西域引进的良马命名为“天马”,后也多次作诗赞誉“天马”。如“天马徕兮从西极,经万里兮归有德。承灵威兮降外国,涉流沙兮四夷服。”(《西极天马歌》)

良马的引进进一步加强了马的重要性,“天马”不仅仅是先秦臆想的异兽,在汉代升仙思想的影响下更是成为一种结合现实与神话的符号。这样的思想,必

然在诸多实物上有所体现,考古发现各类“天马”遗存,勾勒出了“天马”崇拜在艺术作品上的基本形象。

在霍去病墓石刻群中,主体石刻“马踏匈奴”以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手法,运用圆雕、浮雕、线刻等方法,描绘了膘肥体壮的战马将身体蜷缩、手握弓箭的匈奴士兵踏翻在地,“马踏匈奴”虽以写实为基调,但马匹昂首挺立的姿态、肌肉线条的张力所体现的力量,初具“天马”雏形。陕西兴平茂陵一号随葬坑出土的西汉鎏金铜马,则赋予了汗血宝马更接近“天马”的形象。铜马比例精准,双耳竖尖,四肢修长矫健,尾部扬起,加之通体鎏金的工艺,彰显了汉帝国的威仪。在画像石与画像砖中,山东嘉祥武氏祠中也有“天马”图像,描绘出天马腾云驾雾、逾越山川的场景,造型融合了现实马匹的矫健与神话的奇幻,将传统祥瑞与汉武帝时期对宝马的崇拜相结合,体现了天马成为权力与理想的象征。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东汉时期(一说为西晋)的铜奔马,以“马踏飞燕”的动态,将“天马”的速度与力量夸张表现,马的三足腾空、一足踏燕的瞬间,不仅展现了工匠高超的写实技巧与浪漫想象,也象征了汉代人开疆拓土、征服万难的豪情。

“天马”形象始终与汉代的国家意志和开拓精神紧密相连的同时,也带来了文



铜奔马 甘肃省博物馆藏

化内涵的深化,结合汉代儒学“天人合一”的观念与意识。在“天人感应”的信仰认识下,“天马”被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祥瑞,是君主德政与国家兴盛的象征。汉代铜镜、墓室壁画、瓦当、锦帛等文物中都有象征“天马”的马纹出现,其中“天马”往往作为引导墓主人灵魂升仙的“灵驾”,与西王母、东王公等神祇同时出现,使之功能从现实作用延伸到了升仙。如此的“天马”图像也并非对先秦神话的简单模仿,张骞通西域后,西域的驯马技艺、艺术风格传入中原,与中原传统的马文化碰撞融

合,形成了兼具东方与西域特色的“天马”形象。如出土于山东济南章丘洛庄汉墓的鎏金龙马当卢,采用青铜鎏金工艺,主体纹饰为龙马形象,融合龙角、鳞片、羽翼等元素,将汉代的文化信仰与草原斯基泰文化的动物风格艺术结合了起来。这种文化融合在艺术上的体现,正是汉代兼容并包精神的缩影。

“天马”崇拜不仅是汉代艺术的重要内容,更是汉王朝时代精神的体现,是军事强盛的象征,是文化融合的见证,更是中国人排除万难、超越自我的精神的最初表达。